

“功在国家,利在自己”: 新中国初期的保本保值储蓄

丁 芮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1950年3月,国家统一财经工作之后,物价趋稳,人民币币值进一步稳定。为消除民众对物价能否长期稳定的顾虑,国家银行在折实储蓄的基础上开办了保本保值储蓄。保本保值储蓄的适宜举办,对民众来说,改善了生活,增强了储蓄兴趣,初步建立了储蓄习惯;对于国家来说,聚集了社会闲散资金,支援了新中国国家建设。同时,保本保值储蓄的实施,为货币储蓄奠定了基础,也扩大了人民政府的政治影响,体现了新制度的优越性。

关键词:保本保值;储蓄;新中国初期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24)03-0160-09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恢复国民经济,支援国家建设,金融行业大力推动城乡储蓄的开展,折实储蓄^①成为当时人民币币值不稳时期吸引民众储蓄的有效手段。^②1950年3月以后,物价趋向稳落,币值进一步稳定,折实储蓄“折实”^③的意义逐渐失去。继续举办折实存款,难以收到吸收储蓄的效果^④,但民众仍有对物价“是否能长期稳定下去”的思想顾虑^⑤,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在折实储蓄的基础上推出了兼具折实储蓄和货币储蓄性质的保本保值储蓄。保本保值储蓄存款以折实储蓄为基础,但与其不同。折实储蓄主要是稳定物价,让民众树立对人民币的信心,主要在大中城市推行;保本保值储蓄是在物价稳定,折实储蓄吸储功能降低的情况下,继续吸引民众进行储蓄。其在引导民众养成储蓄习惯、沟通城乡经济、聚集闲散资金、促进国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一些论著中对此有简单概述外^⑥,学界尚未进行充分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新中国初期保本保值储蓄的实施及其功效进行分析,以此来深刻认识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管理能力,以及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

①折实储蓄是将货币以规定的实物数量,按存入当天的价格折价存入银行,提取时仍以支取日期的原实物量折价支付现金。参见《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编写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②关于折实储蓄的详细论述,可参见丁芮:《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折实储蓄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4期。

③折实单位是折实储蓄的记账单位。一个折实单位包括一定种类一定数量实物的价格总和。

④《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编写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第66页。

⑤王静然:《人民储蓄事业的成长》,《人民日报》1950年10月7日,第5版。

⑥参见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87页;赵学军:《中国金融业发展研究(1949—195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私人业务管理局:《新中国的人民储蓄》,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23页;赵学军:《国家银行的三次保值储蓄业务》,《中国金融》2020年第4期,等。

越性。

一、适宜的过渡:保本保值储蓄的实施

解放初期,政治尚未稳定,人民币刚刚发行,金融、物价秩序较混乱,银行举办折实储蓄,深受民众欢迎。但至1950年3月,物价初步稳定的新局面比预想提前出现,折实储蓄随之剧减,到5月中旬,折实储蓄仅占储蓄总额的8.25%。^①面对民众既欢迎稳定,又对人民币币值、市场物价存有疑虑的新情况,银行适时推出“双保”(取时物价涨,折实付本息;物价落,货币付本息)的储蓄,很快就被群众接受,激起大的储蓄热潮。

1950年3月18日,“为了适应与便利物价平疲时期的吸收存款”,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保本保值定期储蓄存款章程》,在全国举办保本保值定期储蓄存款,并准许原有折实储户可转存保本保值或提前支取。除机关、公营企业、合作社外,保本保值储蓄不限对象,其种类为整存整付、零存整付、整存零付、存本付息4种。存取办法为存入时按当日折实单位牌价折实收存,到期支取时,可按折实单位数折实付给本息,也可本息均按货币储蓄存款办法付给,听凭存户意愿。^②

以湖南为例,保本保值储蓄存款利息的计算方法是:1951年2月28日龙头细布每尺价为3000元(旧人民币,下同),大米每斤为1000元,食盐每斤为1000元,煤炭每百斤为8000元,将 $3000 + 1000 + 1000 + 8000 = 13000$ 元,即为一个折实单位的牌价。某储户于当日拿130万元上柜存定期3个月的保本保值储蓄,存单上即注明存入100个折实单位。至5月28日到期储户来取款时,如折实单位牌价上升为150万元时,即应支付给储户本金150万元(即升值20万元),利息另计;如果支取日牌价下浮为120万元,则储户的本金照原存130万元支给(保本),利息另计。^③

保本保值的“保本”,就是存户向银行存款,能够保住原存的货币本金;“保值”是存户的存款能够保持货币原有购买力的价值。保本保值使存户的存款,既不受货币下跌影响使原有的本金减少,更不会因物价上涨而遭货币贬值的损失。这种存款充分照顾到了储户的利益,对于储户来说,把钱存到银行不受物价上涨与下跌的影响,可以高枕无忧,稳可保本、稳可保值,“是再好也没有了”。^④

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保本保值是新的存款方式,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应尽量发现问题,及时总结报总,以作改进参考”。^⑤如人民银行北京分行自1950年4月14日开始举办保本保值储蓄存款^⑥,但原办法仅限于整存整付1种。为适应各界需要,自当年5月10日起,增办零存整付、整存零付、存本付息3种。并在整存整付内,增办7天期存款,但对象以有组织的公私营企业职工、机关公务员、学校教职员与学生及群众团体为限;^⑦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同年5月22日也开办保本保值储蓄存款,存款额度至少人民币5万元,多则不限。不限对象,任何人都可存储,存期分1个月、2个月、3个月、6个月、1年5种。^⑧同年8月,经华东区行准许,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修正之前的保本保值存款简章。存期由之前的5种变为6种。^⑨同年12月,又将所办保本保值存款方式进行修正,将开户存额由5万元降

^①李飞等主编、杨希天等编著:《中国金融通史》第6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②⑤}《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为颁发保本保值定期储蓄统一章程并指示内部处理手续有关各点的通知(1950年4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255、253—254页。

^③汤烫主编:《湖南金融百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25—226页。

^④皇:《保本保值储款问题——答武进同志》,《苏北日报》1950年5月7日,第3版。

^⑥《京市人民银行举办保本保值定期存款依物价涨落按折实或货币计算》,《人民日报》1950年4月14日,第4版;《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举办保本保值储蓄》,《文汇报》1950年4月16日,第1版。

^⑦《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增办三种保本保值储蓄》,《人民日报》1950年5月14日,第3版。

^⑧《奖励储蓄彻底保障存户利益人行举办新保本保值存款》,《文汇报》1950年5月21日,第2版;《保本保值定期储蓄存款人民银行规定计息办法》,《文汇报》1950年5月24日,第4版。

^⑨《保本保值存款简章人民银行予以修正》,《文汇报》1950年8月21日,第2版。

低为 2 万元,存期由 6 种增加至 13 种。^① 1952 年,由于物价已基本稳定,储户存储该项存款大部份都是长期的,对于 15 天期已很少需要,该行决定从 1953 年元旦起,将保本保值定期存款的存期,改为 1 个月起到 1 年计 12 种。^②

人民银行总行为适应民众储蓄需求,1951 年 3 月对《保本保值定期储蓄存款章程》进行了补充,增办零存整付、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并对计息办法、存款期限进行了调整。^③ 1951 年 8 月,人民银行总行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存款章程》中,对保本保值存款期限又进行了调整,确定为 7 天、15 天、1 月、2 月、3 月、4 月、5 月、6 月、7 月、8 月、9 月、10 月、11 月及 1 年计 14 种。对提前提取、逾期提取的利息也进行了调整。^④

保本保值储蓄业务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存款业务,“只有在人民政府坚决保证物价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成效”。全国各地开办此项业务距离物价稳定时间都比较短,“这就可看出当时政府对物价政策掌握坚定和确具信心。”由于折实储蓄牌价趋势是逐步下降,保本保值存款举办之初,各地牌价已从最高点回落,并持续保持稳定。从这一走势来看,银行对保本保值业务到期支付时,极大部分是按保本计算,按保值计算的不多,而所支付的折实损失也不大。“这对存户来说,教育意义是高过于实际收益的”。^⑤ 人民银行对这项业务不但继续办理,而且扩大举办到其他储蓄业务上,如 1950 年 12 月间举办的有奖有息储蓄,1951 年 1 月份举办的定额储蓄,均采用了保本保值的原则,同时商业银行也跟随着举办了此项业务。这说明了人民银行对于金融稳定下物价稳定的信心,也说明了在人民币币值刚稳定初期,开展保本保值储蓄是吸引民众储蓄的适宜选择。

二、从城到乡:保本保值储蓄促进人民币下乡

折实储蓄主要是在城市推行。随着物价稳定,人民币信用的提高,开展农村金融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开展农村金融工作,必须要注意照顾农民在接受程度和特殊需要。在开展储蓄方面,要注意到农民不愿暴露财富和怕受物价影响的心理,多以事实教育农民,说通道理,要多办能够保本保值的储蓄,消除农民的储蓄顾虑。^⑥

“农村储蓄,是农村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⑦1950 年初,物价刚趋于稳定,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尚有待提高,传统的储物思想观念也还根深蒂固。货币刚开始下乡,条件尚未完全具备,当时储蓄工作的重点主要是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⑧“广泛向群众进行深入宣传,以解除若干因生疏而引起的疑虑。因而对开展业务的帮助很大。”^⑨“农村储蓄多为保本保值”^⑩,所以保本保值储蓄是银行机构在农村推广与宣传的业务重点之一。在宣传中,银行机关结合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

①《保本保值存款 修订章程实施 今日起,人民银行与全体行庄一致办理》,《文汇报》1950 年 12 月 1 日,第 10 版。

②《保本保值存款改为一个月起保》,《文汇报》1952 年 1 月 4 日,第 3 版。

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为颁发“关于储蓄存款办法的补充规定”的指示(1951 年 3 月 7 日)》,中国农业银行资金组织部编:《金融资金组织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9.4)》,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7—28 页。

④《中国人民银行存款章程(1951 年 8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金融卷”,第 296—300 页。

⑤《财经统一措施后一年来广州经济情况(1951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 1 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业 1949.10—1952”下卷,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78 页。

⑥《大力开展农村金融工作》,《人民日报》1951 年 6 月 7 日,第 1 版。

⑦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会议的综合记录(1951 年 5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金融卷”,第 589 页。

⑧《中国人民银行区行行长会议关于几个问题的决定(1950 年 8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金融卷”,第 584 页。

⑨李恭、薛琳:《察哈尔省建立农村金融小组 扶植生产解除困难受到农民热诚欢迎》,《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15 日,第 2 版。

农民的切身经济利益,着重提出国家银行的储蓄是为农民积小钱办大事,调剂农村资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以达增加生产、改善生活的一种具体措施。针对农民不同的思想顾虑也进行了耐心的解释,争取让民众真正明白保本保值储蓄与其本身经济利益相结合,以促进农村储蓄工作的开展。^①

由于各地政府大力收购土产和特产,人民币逐步地、大量地流入农村,使得农村集镇市场日益活跃,但物价并未因此而波动。以物易物的交换情形在农村随之减少。各地银行结合本地农村情况展开宣传,举办了农民保本保值存款,如人民银行湖州支行及各办事处,结合该地收茧工作,仅1950年6月3日到7日,就收进587户农民的存款,共计14132万元;^②苏南人民银行扬州支行为推动人民币下乡,配合中国蚕丝公司及合作社收购蚕茧,在乡下分设了两个收茧小组,并举办农村保本保值存款,蚕农踊跃存款;^③中国人民银行察哈尔省宣化支行,1951年3月初派出金融工作小组,活动在5个区、56个村庄,办理存款业务,并向农民放款,解决农民生产上的困难。截至4月底,共与15544户建立了存款关系,收到保本保值存款、有奖储蓄等各种存款共39342.9万元。^④

在各地银行机构的推广与宣传下,农村保本保值储蓄取得显著成绩。如苏南的吴江人民银行震泽办事处,至1950年6月4日,共收进存款15000余万元,严墓服务小组在6月2日收进存款800余万元;无锡的夏家边、周新镇也收进很多存款,大多数蚕农都信任人民币的购买力。蚕农们在把蚕茧换成人民币后,到供应站去购买物资(大部分是食米和肥料):吴江地区4个供应站至6月6日共卖出物资351200余万元(回笼货币58.6%),无锡周新镇供应站在一天内售出物资2232万元(回笼货币40%),丹阳县城区、珥陵两供应站至6月2日回笼货币5000余万元。这对推行人民币下乡和开展夏耕夏种,起了极大作用。^⑤

1951年1月,第二届全国金融会议召开,会议指出:“自通货稳定以来,新的城乡关系建立,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农民逐渐富裕,农村金融工作开展的条件已经具备……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逐渐下乡,老区农业生产的恢复,新区农民土改或减租以后生活的改善,农村信用工作,已有条件逐步开展,有了积聚农民闲余及待用资金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可能。”银行应举办各种农民储蓄,“适用当地人民需要的单一折实双保储蓄(棉花、米、布等方式)大力吸收资金”。^⑥如为适应农民需要,开展大米保本保值储蓄等,折实单位的组成仅一种大米,米价涨时可按米价计算,米价跌时可根据货币计算,二者都有利息,“农民莫不称便”;^⑦在产棉区举办了棉花保本保值储蓄,棉花价跌,即按原存人民币金额支取人民币,棉花价涨,即按存单上开明的棉花斤量照当时上涨的棉价折成人民币金额支取人民币。^⑧“这一储存办法,既保证了棉农不因棉花涨价反而受损失,因而解除了棉农看涨惜售的顾虑,大量售出棉花,又使国家银行增加了储蓄存款,同时又使人民币在农村中的信用更进一步的巩固。”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指示,这种储蓄方法“应积极加以推广”。^⑨

土地改革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希望通过资金的储备和融通,以提高生活水平和生产能力。城

①《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会议的综合记录(1951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金融卷”,第589—590页。

②《浙省大力收购茶茧土产人民币逐步流入农村专业公司配合下乡供应农民必需品》,《人民日报》1950年6月30日,第5版。

③《简讯 苏南扬州支行举办农村保本保值存款》,《人民日报》1950年6月30日,第5版。

④王韶光:《中国人民银行宣化支行金融小组深入农村活动》,《人民日报》1951年6月5日,第2版。

⑤《人民政府大力扶持 苏南春茧丰收 行署照顾蚕农利益规定高价收购 蚕区举办保本保值存款》,《文汇报》1950年6月13日,第6版。

⑥《第二届全国金融会议关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编:《1951年国家银行的主要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51年印,第21—24页;李恭、薛琳:《察哈尔省建立农村金融小组 扶植生产解除困难受到农民热诚欢迎》,《人民日报》1951年3月15日,第2版。

⑦《余姚人行举办大米保本储蓄》,《文汇报》1950年10月22日,第3版。

⑧《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棉花保本保值有息两便定额储蓄存款章程》,《文汇报》1951年6月6日,第2版。

⑨《人民银行华东区行 华东贸易部 华东合作总社联合发出指示》,《文汇报》1951年6月6日,第2版。

乡物资交流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使农村储蓄业务的建立逐渐具备条件,并有了开展的可能。因在农村开展的各种保本保值储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农村金融因而得以开展。农民有了货币之后,开展储蓄性存款,“可将农村中分散的零星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扶持生产,并利于组织健全的货币流通”,以解决生产持续与发展中的困难。保本保值储蓄在农村的推广,推动了人民币下乡,巩固了人民币在农村的信用,沟通了城乡货币流通,活跃了农村经济,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①

三、功在国家:为国家积聚资金,支援社会建设

银行资金的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也是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各种经济建设进展迅速,无不需要国家资金。政府着力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和实施货币管理工作,各地人民银行积极开展吸收存款工作进行配合,在保本保值保息的条件下,开办储蓄存款,集聚闲散资金,以供建设用途。这些资金的积累,使政府能掌握足够财力,以支付当时局势下的军需民用。^② 国家建设的发展需要人民群众积极而有效地参与其中。城乡民众从实际生活中也体会到储蓄的好处,深刻地认识到参加储蓄对国家建设有帮助。^③

解放后,人民银行在通货不稳时,首先在各大城市举办了折实储蓄,以保障储户的利益。1950年3月间物价稳定后,又立即在城乡开办了保本保值储蓄,解除了民众因物价下落而产生的对折实储蓄的顾虑,激发了民众的储蓄热情,使得各地人民银行的存款数字显著增加。许多地方1年甚至2年的定期储蓄也有不少储户。如到1950年末,上海人民银行储蓄存款总额已达3134亿元,比1949年末的701.8亿元增加了3.5倍。^④ 浙江省截至1950年11月底,人民银行存款余额较1949年12月增加12倍以上。天津市,如以1949年3月份人民银行的平均存款余额为基数,1950年12月15日的余额即比之增加719%以上,储户也由当时的15000余户激增至20余万户。据人民银行总行统计,截至到1950年4月21日止,存款总额较1950年3月底增加82.8%,较2月底增加127.5%。^⑤

开办保本保值储蓄初期,该项储蓄收储余额占全国储蓄总余额的36.3%。^⑥ 在保本保值的保障下,截至1951年2月底,全国储户增加到500多万户,储存总额较1950年初增加了9倍。^⑦ 到4月底止,全国(东北未计在内)储蓄总额较1950年底增加了120%。^⑧ 人民储蓄之所以迅速增加,主要是由于解放后生产迅速恢复,物价趋于稳定,银行推行了适合民众的储蓄形式,人民的储蓄能力逐渐滋长。^⑨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恢复时期,我国的储蓄发展很迅速,历年的储蓄数字1949年为1007亿元,1950年为13170亿元,1951年为54337亿元,1952年86088亿元,1953年为131918亿元。^⑩ 在全国的城市储蓄中,从1951年起,平均每月增加3000亿元;户数自1951年的300万户发展到1953年底的1000万户以上;定期储蓄(包括有奖储蓄)的比重至1953年9月已增至53.1%,为全国储蓄种类

①《中国人民银行区行行长会议关于几个问题的决定(195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金融卷”,第584页。

②季若:《时局·物价·通货》,《光明日报》1950年11月18日,第8版。

③《适应城市人民对储蓄的迫切要求 人民银行决进一步开展储蓄工作》,《光明日报》1954年4月19日,第1版。

④李飞等主编、杨希天等编著:《中国金融通史》第6卷,第47页。

⑤《全国各地人民银行储蓄业务迅速发展》,《人民日报》1951年1月8日,第2版;《全国人民银行大力推行储蓄业务 有了很大发展 去年全国储蓄存款总余额较前年底增加了九倍》,《文汇报》1951年1月7日,第8版。

⑥高明主编:《当代中国的储蓄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9页。

⑦⑧《物价稳定人民生活上升 储蓄事业迅速发展 目前已有储户五百余万户 储款总额较去年初增加九倍》,《人民日报》1951年3月28日,第2版。

⑧《中国人民银行储蓄业务迅速发展 全国储额较去年增加一倍以上 为国家提供了巨大数额的建设资金》,《光明日报》1951年5月29日,第2版。

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私人业务管理局:《新中国的人民储蓄》,第24—25页。

的第一位。^①截至1954年2月底，全国城市储蓄额已达110300亿元。这笔资金，如果折算一下，可以装备17个十万纱锭的工厂；可以铺设1600公里的铁路；可以制造55150台拖拉机；可以购买7353架喷气式战斗机。^②随着保本保值储蓄等的推进，人民银行的储蓄业务由大城市逐步发展到中小城市和农村。中小城市的储蓄比重由1950年底的28%增加到1951年5月的45%。农民们大都愿意将剩余的资金储蓄起来准备扩大生产。^③这些储蓄对积聚零散资金，投入经济建设及稳定金融物价都起到积极的作用^④，“成为国家经济建设可靠的不断增长的资金来源之一”。^⑤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银行业始终把支持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动的恢复、发展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1950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金融会议强调：银行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方法去争取存款，积累尽可能多的资金，支持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⑦在此思路下，中国人民银行在信贷政策上首先支持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从1950年到1952年，银行对国营工业的贷款增长了3倍，对国营商业部门的贷款增长了5.5倍。^⑧

由于银行信贷配合人民政府大力支持和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国营经济发展很快，到1952年底，全国国营工业企业达到9500多家，职工2510多万人，国营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41.5%，不但在生产资料生产中继续保持优势，在消费资料生产中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此同时，商业领域也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领导，以合作商业为助手的全国性社会主义商业网。与1950年相比，1952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70%，国营商业销售额增加3倍以上，合作社商业增加5倍以上。社会主义商业在整个销售额中所占比重，由1950年的19.4%增长到51.9%。随着国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财政收入逐步转到依靠国营企业提供税利为主，财政的基础日趋稳固。^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要建设但缺乏资金，累积资金成为一桩重大而又艰巨的工作，储蓄是积累资金的主要手段之一。^⑩1950年物价趋稳后，人民银行不断修正保本保值存款章程，引导人民储蓄以支援抗美援朝，这既是一项爱国行动，又增加了民众收入，符合民众需求。国家银行通过保本保值储蓄，集中了社会上闲散零星资金，使之服务于生产建设，以免游离市场而变成投机活动，这对市场和物价的稳定，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繁荣经济等方面都起了应有的作用。^⑪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增加的结果，必然带来就业面的不断扩大，民众货币收入的不断增加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又反过来为储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⑫

①⑤《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一九五四年城市储蓄工作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私人业务管理局编：《城市储蓄资料汇编》，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5页。

②《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私人业务局姚桐局长在城市储蓄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中国人民银行私人业务管理局编：《城市储蓄资料汇编》，第11页。

③《中国人民银行储蓄业务迅速发展 全国储额较去年增加一倍以上 为国家提供了巨大数额的建设资金》，《光明日报》1951年5月29日，第2版。

④《全国人民银行大力推行储蓄业务 有了很大发展 去年全国储蓄存款总余额较前年底增加了九倍》，《文汇报》1951年1月7日，第8版。

⑥⑨李飞等主编、杨希天等编著：《中国金融通史》第6卷，第53、56页。

⑦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80—81页。

⑧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六十年（1948—2008）》，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⑩季若：《巩固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光明日报》1950年12月2日，第8版。

⑪《上海人民储蓄事业有很大发展 目前积累的余额可建造五条成渝铁路》，《文汇报》1953年10月16日，第2版。

⑫中国人民银行工商信贷局主编：《中国人民储蓄事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四、利在自己:改善生活民众,初步建立储蓄习惯

保本保值存款“由于兼有折实存款和货币存款的优点,切合客观需要”^①,增加了存户的信心,给存户带来方便与好处,“因而立即为广大群众所普遍拥护”。^②

据统计,在上海,1950年5月开办保本保值储蓄业务第1天,各公、私银行机构共收到存款超过74亿元;^③在北京,保本保值储蓄开办至当月24日,人民银行北京分行有存户3349户,存款总额达54.5万余折实单位。许多原有折实储蓄存款储户纷纷要求转为保本保值存款。^④截止到1950年4月22日,与3月底相较,户数增加27倍,存入金额增加600多倍。^⑤举办后的半个月,收储金额达233.2亿元,占储蓄存款总额的70.6%。^⑥

人民银行汉口分行举办的保本保值储蓄,自1950年4月20日至5月20日1个月内,存户达9432户,存款总数达119亿元。各种存款平均期限,一般亦较前延长。^⑦人民银行青岛分行1950年4月21日开办保本保值储蓄存款,当日吸收存款达19000余个折实单位。^⑧截至4月底,人民银行青岛分行,保本保值存款金额大大增加。保本保值存款户中,职工占49.8%,市民占26.6%,私营工商业者占23.6%。存款的期限,自从币值稳定后,各地都逐渐改为1月、2月、3月、6月、1年以至2年为期的存款。^⑨

人民银行扬州支行1950年5月5日举办保本保值储蓄以后^⑩,至6月26日,每日余额已达3.5亿元;南通支行5月12日开办,至6月23日,余额高达12.6亿元。其中长期储蓄日渐增加,扬州支行储蓄1个月至6个月的存户,占总额数一半以上,1年期的亦有1户;南通支行1个月至6个月的存户,亦达40%以上。由于保本保值存款的增加,及存款期限的延长,银行的储蓄存款得到很大增长。扬州支行的储蓄存款余额,至6月26日,达到了11.3亿元,比5月底增加一成半以上。^⑪

河北省人民银行1950年5月在全省开办保本保值储蓄,7个多月的时间,保本保值储蓄余额即为其它储蓄存款总余额的一倍多。1951年底,全省保本保值储蓄余额达732.4亿元。^⑫1950年年底,宜昌市保本保值储蓄存款占储蓄存款总额的77.5%。^⑬

个人的生活和国家建设一样,也需要精打细算,留有后备。储蓄就是计划安排生活,留有后备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储蓄不仅为国家生产建设提供了资金,也为改善个人生活储蓄了一定的后备。1950年3月,物价稳定后,由于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求参加储蓄的人日渐增多。人民银行举办的保本保值储蓄和定期、活期、有奖等多种储蓄,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到1954年2月底,城市民众的储蓄额比1950年增加了10倍。民众把钱存在国家银行,不仅减少资金浪费,而且得到了一笔优厚的利息。1952年,人民银行付出的利息就达7800亿元。^⑭

①《人行定期货币存款可按保本保值转存》,《文汇报》1950年6月30日,第3版。

②王静然:《物价稳定本币信用日高 全国各地存款激增 四月底余额较二月底增加两倍多》,《人民日报》1950年5月17日,第2版。

③《保本保值定期存款 存户踊跃 第一天储额逾七十四亿》,《文汇报》1950年5月25日,第4版。

④《原为折实储蓄存款 可转保本保值存款》,《光明日报》1950年4月26日,第4版。

⑤《人民银行京分行主动开展业务 存款激增七百余亿 四月份超过原计划百分之六二》,《人民日报》1950年5月8日,第3版。

⑥《当代北京金融史料》编写组编:《当代北京金融史料》下册,1988年印,第124页。

⑦《人民银行中南区行 提前完成吸收存款上解任务》,《人民日报》1950年5月29日,第2版。

⑧《全国物价普遍稳定 各地银行存款激增》,《光明日报》1950年4月28日,第1版。

⑨陆超祺:《全国金融情况日趋稳定 人民币进入农村信用更加巩固》,《人民日报》1950年6月30日,第5版。

⑩《保障存户利益 扬州支行首先举办 保本保值储蓄存款》,《苏北日报》1950年5月7日,第2版。

⑪《保本保值存款 各地开展迅速 长期存户日有增加》,《苏北日报》1950年7月3日,第3版。

⑫河北省工商银行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城市金融志》,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

⑬宜昌市金融志编辑室:《宜昌市金融志(1840—1985)》,宜昌市金融志编辑室1989年印,第164—165页。

⑭《适应城市人民对储蓄的迫切要求 人民银行决进一步开展储蓄工作》,《光明日报》1954年4月19日,第1版。

储蓄存款的增加说明民众储蓄能力日益提高,货币有了积余,改善生活也就有了条件。参加储蓄的民众可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随时取出存款。新中国的民众储蓄,是壮大经济、巩固新生政权的物质基础,也为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生活水平服务。它既是国家积聚建设资金,加速新中国建设的工具,又是广大民众有计划地安排生活的工具。^①

“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很大的开支,所以我们在消耗方面不能开支太多。这就需要我们提倡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传统作风。”^②新中国初期,通过银行对保本保值储蓄等广泛深入的宣传,储蓄的意义家喻户晓,改变了民众过去的储蓄观点。民众都感到参加储蓄是日常生活中一项必要的活动,并逐渐体验到参加储蓄是一种美德,养成了节约的社会风气;广大民众通过储蓄,也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储蓄开始成为习惯,储蓄业务得到更迅速的发展。^③民众储蓄兴趣的增加,改变了原有的储蓄观念,更真实地体会了新制度的优越性。^④

余 论

随着物价稳定、币值提高,民众生活逐渐改善,其关注点从保本保值转向利率高低、存储是否方便等方面,因而货币储蓄逐步增多,保本保值储蓄逐渐减少。保本保值存款余额 1951 年第一季度占储蓄总额的 27%,第二季度降至 24.3%,第三季度降至 18.7%,年底更降至 18.7%。1952 年再度降低,第一季度仅占 14.6%。1952 年 4 月,上海的保本保值存款比 1951 年底降落了 62%;天津也降落了 52%,在 1952 年 6 月以前,已不到 10%。人民储蓄事业走上了完全以货币储蓄为收储单位的新阶段。^⑤

保本保值储蓄等“本系从物价上涨到物价稳定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过渡存款方式”,在物价趋向稳定时,“所有各项过渡存款方式已不宜继续发展”。^⑥随着人民币信用的提高,其计价与储蓄职能得到正常发挥,以折实为基础的保本保值储蓄必然向货币储蓄转化。物价长期稳定的趋势也逐渐为民众所认同,民众对货币储蓄逐渐重视起来。折实类的储蓄作用已“逐渐消失,结余金额也极有限,事实上群众自动取消这种存款方式”。^⑦1952 年 7 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新的储蓄存款章程,停办折实储蓄、保本保值储蓄、大米单一折实储蓄、棉花双保定额储蓄等储蓄形式,这些储蓄到期后可按到期日牌价折成货币改存。^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银行根据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不同形势,紧紧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和政策,首先考虑民众的利益,适时地开展了保本保值储蓄,体现了人民政府对于物价和人民币币值的信心,也体现了人民政府建立新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能力。保本保值储蓄作为过渡性的储蓄形式,为社会主义货币储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支援社会建设积聚了资金,更为提升人民政府的政治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① 中国人民银行工商信贷局主编:《中国人民储蓄事业》,第 8—9 页。

② 周恩来:《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关键(1949 年 4 月 22 日)》,《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 页。

③ 《上海人民储蓄事业有很大发展 目前积累的余额可建造五条成渝铁路》,《文汇报》1953 年 10 月 16 日,第 2 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私人业务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作小结(节录)(1958 年 3 月 22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金融卷”,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85 页。

④ 《上海人民储蓄事业有很大发展 目前积累的余额可建造五条成渝铁路》,《文汇报》1953 年 10 月 16 日,第 2 版。

⑤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私人业务管理局:《新中国的人民储蓄》,第 28 页。

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为颁发“定活两便储蓄存款简则”在已办该种存款的行处实行的通知(1950 年 6 月 23 日)》,中国农业银行资金组织部编:《金融资金组织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9.4)》,第 15—16 页。

⑦ 陆超祺:《集中资金,扶持生产——记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人民日报》1950 年 8 月 25 日,第 2 版。

⑧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为颁发修订储蓄存款章程(草案)并注意各点的指示(1952 年 7 月 16 日)》,中国农业银行资金组织部编:《金融资金组织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9.4)》,第 43—46 页。

[本文为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 2023 年度规划课题“中国共产党早期红色金融实践及历史经验研究”(23ZXHYG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丁 芮(1978—),女,河南汝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千

Merit to the Country, Benefit to Oneself:

Break – even and Inflation – proof Bank Savings in the Early Years of PRC

DING Rui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In March 1950, after the country unified it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work, prices stabilized and the value of the RMB further stabilized. To eliminate people’s concern about the long – term stability of prices, the National Bank established break – even and inflation – proof bank savings on the basis of discounted savings. For individuals, the proper holding of break – even and inflation – proof bank savings had improved people’s lives, promoted people’s interest in saving, and laid a foundation for monetary saving. For the entire country, it had gathered idle social funds to support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New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break – even and inflation – proof bank savings had also expanded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reflecte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new system.

Key words: break – even and inflation – proof bank savings; savings; early years of PRC

(上接第 124 页)

The Illusion and Reality of Meiji Experience:

Another Observation of Wu Rulun’s Inspection of Japan’s Education in 1902

MIAO Yiqi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6, China)

Abstract: Reforms in education and cultur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often drew inspiration from Japan. Among these reforms, one major concern for those who visited Japan for educational inspections was how to reconcil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cademic principles and establish a n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Among the numerous educational inspections to Japa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Wu Rulun’s journey in 1902 stood out prominently. During his stay, the diverse perspectives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Japanese intellectuals, stemming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positions, showcased a scene of intense debates. These debates revolved around Confucian moral ideals versus Western ethics, traditional Kangaku versus modern “common knowledge”, reflecting Japan’s dilemma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academic ideologies during the late Meiji period. By reflecting on and adapting the experiences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Meiji Japan, Wu Rulun formulated a unique vision for reforming national education and reinforced his determination to preserve traditional learning by incorporating ancient prose. Behind the facade of late Qing Dynasty’s educational reforms referencing the “Japanese channel”, lay the tumultuous discourse within the Japanese educational sphere at that time. Simultaneously, observing the strategies adopted and transformations implemented by the Chinese side not only helps illuminate the reality of Meiji Japan as an “experiential” phenomenon but also facilitate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rajectory of late Qing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reforms.

Key words: Wu Rulun(吴汝纶); Kangaku; moral education; common knowledge; Meiji Japan